

# 河南师范大学

## 科学讨论会论文集

语言文学分册



河南师范大学科研处

## 前 言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，为了庆祝建国三十周年，我校恢复了中断十五年之久的全校性教学讨论会和科学讨论会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了第五次教学讨论会和第十次科学讨论会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共提出论文一百六十篇，举行大、中、小型报告会、讨论会一百二十次，这对我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，都起了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。为了反映这次讨论会的成果，我们将中文、历史、政教教育教研室等系（室）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部分文章和艺术系创作的歌曲，分别汇集成册，以供参考。

河南师范大学科研处

一九八〇年四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·····    | 任访秋 ( 1 )   |
| 关于屈原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      | 牛庸懋 ( 19 )  |
| 再论《尉繚子》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——兼答钟兆华同志·····         | 何法周 ( 38 )  |
| 论《诗毛氏传》·····           | 李 博 ( 56 )  |
| 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| 李春祥 ( 76 )  |
| 中国文学划时代的作品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——论鲁迅五四时期小说伟大的历史意义     |             |
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任访秋 ( 115 ) |
|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·····       | 黄平权 ( 129 ) |
| 社会主义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·····     | 孟宪法 ( 151 ) |
| “境界说”初探·····           | 王振铎 ( 161 ) |
| 破模式 抓特点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——中学语文教学试探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·····写作教研室部分同志讨论刘溶执笔   | ( 180 )     |
| “所以”不是介宾词组·····        | 未 已 ( 198 ) |
| 试谈“从甲到乙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丁恒顺 ( 205 ) |

## 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

—  
任 访 秋

梁启超(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二九)字卓如,号任公,广东新会人。四五岁,就从他的祖父及母亲,读《四子书》《诗经》。六岁后就父读,受中国略史、《五经》卒业。八岁学为文,九岁能缀千言,十二岁应试学院,补博士弟子员。十五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,从事训诂词章之学。十七岁(一八八九)举于乡,十九岁与陈千秋受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,康氏教以陆王心学,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,生平知有学问自此始。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失败后,曾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。接着康有为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,启超随其师多方奔走。一八九六年去上海,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办《时务报》,专任撰述,有《变法通议》、《西学书目表》等著述,宣传维新变法。不久受陈宝箴江标之聘,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。

一八九八年参与康有为等人的维新运动,曾被载湉召见,命办大学堂肄书局事务。由于清廷顽固派对维新派进行

镇压，六人死难，启超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赴日，从此开始流亡生活。（《三十自述》）

庚子事变后，从日本回上海，拟参加唐才常林圭等人发起的勤王运动。到沪后，就听到了汉口失败的消息，遂去南洋澳洲。一九〇二年在日本创办《新民丛报》及《新小说》杂志，并出版《饮冰室文集》。一九〇五年，著《开明专制论》，大倡君主立宪主义，反对排满革命，与当时同盟会所代表的革命派进行论战，终因违反时代潮流，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
辛亥革命后，由日本返国。一九一三年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。一九一五年，袁氏准备帝制，蔡锷在云南发动了护国之役，梁启超发表了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反对袁氏帝制，赴云南参与这一倒袁运动。不久袁氏以忧愤卒。继袁氏之后，一九一七年又有张勋的复辟之举，不久也宣告失败。这年，梁启超就任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。一九一八年欧战告终，赴欧游历，著《欧游心影录》。一九二六年，讲学清华研究院。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，卒于北平。遗著有《饮冰室合集》。（杨复礼《梁任公先生年谱》）

## 二

梁启超的文学观，源于他的学术思想。而他的学术思想，又源于：一、陆（九渊）王（阳明）的心学。这是他早年受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时，首先学到的。这派思想是上承孔孟，特别把孟子的唯心主义作了进一步地发展，成为极端的唯心主义学派。从梁启超一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，他在这几方面受这派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，（一）以天下为己任的

思想。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，而他自己则认为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！”梁启超早年也是把开辟新的时代，转移社会的风气，作为己任，因而自号任公。在《自励》诗中，陈述自己的抱负道：“献身甘作百矢的，著论求为百世师。誓起民权移旧俗，更研哲理牖新知。十年以后当思我，举国犹狂欲语谁！”梁启超在庚子前后从事新闻工作时，发表的许多时论文章，的确在当时曾影响了一代的知识分子。

（二）王学根据孟子“良知”之说，提出了“良知”。梁启超处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化之时，一方面中国固有的学术，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；另一方面西方各种学术流派，又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。在这时，他常常根据自己之良知，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，而为之抉择。但时事多变，而一切事物之演进，非能全如个人之所预期，所以他在政治主张上，常常变化。即如他在刚刚逃往日本后，曾一度主张排满，大倡破坏与暗杀。但不久，又主张保皇，最后又反对袁氏的帝制。又如对于袁世凯，初为政敌，后来又合作，不久又起而谋打倒之。这种反复变化的根源，即在于全凭个人一时之良知加以抉择的缘故。他曾说：“启超……保旧性，进取性，常交战于胸中，随感情而发，所执往往前后矛盾，尝自言曰：‘不惜以今日之我，难昔日之我。’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

其次为常州派的公羊学，清代最早提倡这派学术的为刘逢禄与庄存与，继之者为龚自珍同魏源。他们两人论政之文极多，都是一面讲今文，一面议经世。到了后来，康有为之学，就是从这派衍出的。梁启超早年从学于康氏，因而熟读龚魏之书。他说：“我们年轻时，读他二人的著作，往往发

烧。南海康先生的学风，纯是从这一派衍出。我们一面赞成今文家的政治论，一面反对旧有的传统思想，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

由于讲“公羊学”，就大讲其三世之说，所谓据礼世，升平世，太平世，以及《礼运》中的“小康”“大同”之说。康有为根据此义，并吸收西方各派哲学思想，因而构成了他对未来的大同世界的理想。（《大同书》）

三、是西方思想，他曾说：“启超平素主张，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。……启超务广而荒，每一学稍涉其樊，便加论列，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，甚至纯然错误。及其自发现，而自谋矫正，则已前后矛盾矣。平心论之，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，非用此种鹵莽疏阔手段，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，就此点论，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二十六）他曾对西方的哲学与科学的各种流派，进行了大量的介绍。在哲学上有斯宾挪莎、霍布士、边沁、亚里斯多德、卢梭。科学上有培根、达尔文、笛卡尔……等。同时他又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与孔教相比附，说：“孔教乃进化主义，非保守主义；乃平等主义，非专制主义；乃兼善主义，非独善主义。”（《论支那宗教改革》）……等等。这种观点，的确如乃师康有为所说的，是“託古改制”，实际这不是什么学术研究，不过是用这傅会的说法，来推行他们所提倡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罢了。

根据以上的论述，可知他由于受孔孟以及后来的陆王心学的影响，因而具有“英雄造时势”的观点，以先觉者自居，勇于批判旧的，提倡新的，企图靠自己的一支笔，来唤

醒世人，转移时代的风气。同时又由于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，所以他鼓吹民权，反对专制。特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曾一度主张破坏，把几千年来从政治制度，以及腐朽的学术思想，风俗习惯等一举而摧陷廓清之。由于他接受进化论的影响，因而使他向前看，提倡改革，反对因袭和保守。但也由于进化的观点，所以主张渐变，反对突变。主张政治上的改良，而反对革命。尤其在一九〇六和〇七年，由于他囿于维新派固有的成见，未能客观地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，于是同革命派在改造中国的方向道路上，以及对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清王朝所持的态度上，所进行的激烈论战，充分显示出他对形势潮流的误解，这样就使他由一个改良派，变成为一个反革命派。最后他在论争上的失败，证明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。

辛亥革命后，梁启超在政治上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关系，说明了在政治上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。因为一个改良主义者，只有依附于现实中的当权派，才有可能实现个人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张。但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，不论是袁世凯，还是以后的段祺瑞，没有一个不是外而投靠帝国主义，内而残害人民的。他们压根就没有改造中国的打算，甚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不惜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。因此梁启超最初与袁世凯合作，以后又与段祺瑞合作，其结果只不过成为他们政府中的点缀品，个人的理想，无不一一化为泡影。斯大林曾经说：“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，便要做革命家，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。”（《联共布党史》第四章）晚清康梁等改良主义的失败，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

理。

### 三

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渊源已如上述，那么表现到文学观上，就产生了以下两种革新的主张。

一、文学的进化观。这个观点，在当时是具有极大的革新作用的。因为中国文人，过去大半在儒家复古主义的思想束缚下，多半严重的存在着“厚古薄今”的观点。所以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看法，不仅明代前后七子是这样，即清代不少文人，也很少不受其影响的。“书不读秦汉以下”成为流行的春联的上联。梁启超因为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，所以他就把它运用到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观点上，再加上他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论的影响，所以就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学进化观。

他说：“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，即由古语之文学，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。各国文学史之开展，靡不循此轨道。中国先秦之文，殆皆用俗语，观《公羊传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，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，不少，可谓左证。故先秦文界之光明，数千年称最焉。寻常说者，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，余曰：不然。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，如即唐代韩柳诸贤，自谓起八代之衰，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？昌黎谓：‘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’，余以为此其受病之源也。自宋以后，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，何以故？俗语文学大发展故。”（《小说丛话》阿英《晚清文学丛钞》《小说戏曲研究卷》）

他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又说：“中国结习，薄今爱古，

无论学问、文章、事业，皆以古人为不可及。余生平，最恶闻此言。窃谓自今以往，其进步之远轶前代，固不待蓍龟。即并世人物，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？生平论诗，最倾倒黄公度，恨未能写其全集。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，（按指《锡兰岛卧佛》）乃煌煌两千余言，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。荷、莎、弥、田诸家之作，余未能读，不敢妄下比隣。若在震旦，吾敢谓有诗以来，所未有也。”这都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在反对“厚古薄今”的复古主义的观点。而这种观点，正是从进化论思想产生的。在这样思想指导下，所以他提倡“诗界革命”，提倡作品要独创，反对因袭同模拟，把那些宗古模古，对古人亦步亦趋的复古派的作品，一脚踢开，企图创造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文坛。

其次在具体实践上，主张文章要通俗化，与言文合一。他在讲述了中国文学的进化论之后，接着又说：“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：其一，则儒家禅宗之语录。其二，则小说也。小说者，决非以古语之文体，而能工者也。本朝以来，考据学盛，俗语文体，生一顿挫，第一派又中绝矣。苟欲思想之普及，则此一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，凡为文章，莫不有然。”（《小说丛话》）这就说明，要想普及新思想，必须采用俗语文学，也就是五四时期所说的“白话文”，并且不只小说要采用，所有文章都应采用。

另外他在《新民说》《论进步》一文中，曾痛陈言文分离的弊病，而主张言文的合一。他说：“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，其繁简难易，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。……言文合，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，一新名物新意境出，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，新新相引，而日进焉。言文分，则言

日增而文不增，或受其新者，而不能解。或解矣而不能达。故虽有方新之机，亦不得不窒，其为害一也。言文合，则但能通今文者，已可得普通之知识，其古文之学，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。故能操语者，即能读书，而人生必需之常识，可以普及。言文分，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，不足以语于学问。故近数百年学者，往往瘁毕生精力于《说文》《尔雅》之学，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，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，其为害二也。且言文合，而主衍声者，识其二三十之字母，通其连缀之法，则望文而可得其音，闻音而可解其义。言文分，而主衍形者，则《苍颉篇》三千字，斯为字母者三千，《说文》九千字，斯为字母者九千。《康熙字典》四万字，斯为字母者四万。夫学二三十字母，与学三千、九千、四万之字母，其难易相去何如？故泰西日本，妇孺可以操笔札，车夫可以读新闻，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，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，其为害三也。”

还有他在《沈氏音书序》中，又申明我国古代言文一致，所以“古者妇女歌咏，编为诗章，士大夫问答，著为辞令，后人皆以为极文学之美。”“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，一宗于古，其结果专门之士，或乃穷老尽气，不能道小学，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，知书者往往而绝也。”因此，他盛赞用字母拼音的方法，来使言文合一，这样读书识字的智民，就可以一天天多起来了。这在当时，应该说是非常先进的主张，是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，同文字改革的人们的先驱。

三、强调小说（包括戏曲）的教育作用，和转移风气的巨大效能，因而推尊“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”，提出“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，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”的口

号。在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杂志之前，我国一般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，没有不轻视小说戏曲的，它们把它们看作小道，听其自生自灭。更有甚者，是把小说戏曲一概看作诲淫诲盗的坏东西，而加以诋毁，并主张一律禁毁。梁启超在当时由于从进化论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，认为宋元以来俗语文学的发达，是中国文学的大进化，也就是认为应该把小说戏曲，看作是中国近世文学的主流。

梁启超又因为受到西方文学观的影响，因而批判了中国文人一向鄙视小说戏曲的错误观点，所以在一八九八年，他为配合维新派变法运动，就着手译印有关政治小说，用以教育群众。（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）到了一九〇二年，他创刊《新小说》杂志时，他的见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他在该刊的一卷一期上发表了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，强调小说的作用，抬高小说的价值，他指出小说具有四种力，足以支配人道。这四种力，即熏、浸、刺、提。熏、是熏陶；浸、是浸润；刺、是从空间而言，浸、是从时间而言。刺、是刺激，提、是提高。用最典型的事例，给读者以刺激，用正面的典型人物，给读者以感发。由于小说具有此四种力，所以它能够“卢牟（犹言牢笼）一世，亭毒（化育也）群伦，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，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，莫不赖是。”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，则可以福亿兆人。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，则可以毒万千载。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。”此外他还认为于日本维新之道有大功者，则小说亦其一端。（《传播文明之利器》）正因为这样，他推许“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。”接着他论到中国社会上种种迷信思想，名利思想，颓废思想，以及种种自私自利，卑鄙齷齪，伤风败俗，粗暴野

蛮的行为，都是由于小说内容不健康所造成的。

因此，他慨叹道：“大圣鸿哲数万言淳海之而不足者，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。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，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，而其性质其位置，又如空气然，如菽粟然，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，不可得屏之物。于是华士坊贾，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。呜呼！使长此而终古也，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？”最后他大声疾呼道：“故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。欲新民，自新小说始。”

四、主张文学为革新政治服务，提倡反映现实，揭露现实，讽刺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。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，录东亚伤心人依白乐天《新乐府》诗题名“《哀星轺》，i辱国也”，“在前边加的按语道：“顷得上海一匿名书，自题东亚伤心人者，内新乐府一章，属登报。读之，香山、西堂（尤侗号西堂诗仿白乐天）不是过也，因急攫之，以实我《诗话》。”此外《诗话》中又选录报纸上的反映现实的几篇作品，如《黄花谣》、《都司斩》、《总兵囚》……等，按语道：“近日时局，可惊、可惧、可哭、可笑之事，屡见叠出。若得《西涯乐府》之笔写之，真一绝好诗史也。顷从各报中见数章，谑而不虐，婉而多讽，佳构也，录之。”

就这些诗来看，《哀星轺》揭露了中国驻日公使的丑态，用贿赂与献媚的手段，谋得了公使的职位。到任后，与留学生发生了冲突，竟至蓄意谋害学生，所以诗里骂他“市侩得志惯横行，紫绶金章衬绿巾，君名不愧替钱死。”《黄花谣》大力揭露并讽刺八股取士制度，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与陵辱，特别是后四章，是反映辰州教案的，揭露帝国主义专

横，同情人民群众反帝的义愤，痛斥清王朝对外的卑躬屈膝，对人民进行镇压，对官吏实行惩办，等等卑怯卖国的丑行，令读者为之发指，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作品。从梁启超对这些作品的评价，就鲜明地看出他的文学主张了。

此外诗话中还录了黄遵宪的《出军歌》、《军中歌》、《旋军歌》三首，并竭力加以揄扬。按黄诗共二四章，其每章最后一字，意思是连贯的，以“鼓勇同行，敢战必胜，死敌向前，纵横莫抗，旋师定约，张我国权，”二十四字作殿。《诗话》中称其“精神之雄壮，活泼，沉浑，沉远不论，即文藻亦二十年所未有也。诗界革命之能事，至斯而极矣。吾为‘一言以蔽之’曰：‘读此而不起舞者，非男儿也。’”

以上的诗论，他不仅发展了白乐天的“诗歌合为事而作，合为时而作”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，并且进一步主张用诗歌为当前的政治服务，把它作为鼓舞人民，捍卫祖国的武器了。

五、对诗文的革新主张。在诗的方面，梁启超和他的同道们，曾提出“诗界革命”的口号，他反对因袭模拟，诋訾过去一惟步趋古人的词章家为“鹦鹉名士”，谓“今日不作诗则已，若作诗，必为诗界之哥伦布、玛赛郎。”接着又提出：“欲为诗界之哥伦布、玛赛郎，不可不备三长：第一要新意境，第二要新语句，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。”（《汗漫录》见《饮冰室文集类编》下）从意境来说，是指的诗的内容，从语句来说，是指的诗的语言。这种对内容与语言的革新，自然会把诗歌创作向前大大的推进一步。

在散文上，他主张文章须发于至诚，而反对用什么绳墨来评论前人的作品。他说：“如冬烘先生之批评古文，以自

家之胸臆，立一定之准绳，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，皆有定规，若者为双关法，若者为单提法，若者为抑扬顿挫法，若者为波澜擒纵法。自识者视之，安有不喷饭者也。”（《烟士披里纯》见《类编》下）梁启超自己的文章，就是解放了的散文的最好的典型。他晚年评论他的文第道：“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为文，学晚汉魏晋，颇尚矜练，至是自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韵语，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，学者竞效之，号为新文体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二十五）

根据上边所讲的梁启超的革新文学见解来看，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，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。但其中部分观点，是不够正确的，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，这将在后边论述。

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不仅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对文学革新的理论见解，同时还在于他对这一运动的发展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。即：

一、创作上的实践。先就散文而论，他的早期作品，在内容上是新颖的，并且具有革命性，同强烈的感染力。他以所接受的西方先进思想的进化论，同民权论的观点，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同文化，于是对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痼疾，进行了揭露与抨击，同时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主张。这些主张，虽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，但却代表了当时群众的呼声，同时代的呼声。在这样新的内容决定下，在形式上就不得不打破一切古文学的清规戒律。正如他自己讲的：“至是自解放，……纵笔所至，不检束”，所以才能震撼人心，风靡一时，形成一种“新文体”。即如他的名

篇《论进取冒险》、《论进步》、《少年中国说》、《呵旁观者文》以及《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》等，在当时风行全国，至今读之犹能令人张脉偁兴而为之感发兴起。

在诗歌上，梁启超本不是以诗名的，但他偶有所作，也是实践了他的要有新意境与新语句的主张的。从内容看，表现出他的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的有《自厉》，同《举国皆我敌》。表现他的高度爱国思想的，有《壮别》，同《书感四首》。另外还有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揭露与抨击的，如《去国行》，直斥洋务派头子张之洞的如《刘荆州》。在写作方法上，常常用新词汇，表现新意境。至于在诗中进行叙事抒情同说理，在开辟前人未有之境上，真可与黄遵宪的诗作比美。如《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》、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，真是纵横恣肆，波澜起伏，形成了特有的雄浑豪放的风格。

在小说戏曲方面，梁启超为了提倡从内容上进行革新，所以他写了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戏曲《新罗马传奇》、《劫灰梦传奇》等。尽管在写作技巧上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，但却洋溢着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同民主主义思想，并充满着反帝排满的情绪。

二、在所办的报纸刊物中，大力地宣传文学革新运动。梁启超于一八九六年，在上海主编《时务报》，一八九八年维新变法失败后，逃往日本，创办《清议报》，一九〇二年创办《新民丛报》，与《新小说》杂志。在这一段流亡生活中，他特别注意对文学革新的宣传工作。在《清议报》中，发表了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同时还发表了政治小说《佳人奇遇》、《经国美谈》等。在《新小说》中除发表了理论文章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外，在创作上发表了他所写的《新

中国未来记》、吴沃尧的《痛史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九命奇冤》等，还有苏曼殊等人翻译的小说。此外在《新民丛报》上还发表了《饮冰室诗话》，大力鼓吹“诗界革命”的主张。这些理论创作同翻译，对当时中国文坛，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继《新小说》杂志之后，在国内文坛上，小说刊物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出现。一九〇三年，上海出版了《绣像小说》，里边发表了夏曾佑的《小说原理》一文，至于该刊的政治倾向，从夏文中可以得到说明。一九〇六年，又有《月月小说》与《新世界小说社报》的出版，而前者主要撰稿人为吴沃尧。一九〇七年，又有《小说林》同《小说月报》的发行。在这样的倡导下，于是小说与戏曲的地位，在群众的眼目中，同过去已有天渊之别，而新著新译的小说，亦层出不穷。所以《月月小说》的序中说：“吾感夫饮冰子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之说出，提倡改良小说，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，几乎汗万牛，充万栋，犹复日出不已，而未有穷期也。”另外鲁迅后来从事文学运动，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。据周作人回忆，鲁迅和他在东京时，颇注意林琴南、苏曼殊等人译的外国作品，谈到梁启超，他说：“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《新小说》。《清议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的确都读过，也很受影响。但是《新小说》的影响，总是只有更大，不会更小。梁任公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当初读了，的确很有影响，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，后来意见稍稍改变，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，渐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。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，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，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，振兴民族精神，用后来